

# 国际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美]约瑟夫·奈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学术界和决策圈存在着一定固有的区别,但近些年来二者的鸿沟在日益加大。学术界和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合作和了解,促进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学者们也应当加强务实性,密切同政府的联系。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与实践 政策制定 学术界

在实践中,理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其目标,人们需要至少是初步的因果意识,以及简化和解释现实的手段。如果我要求你描述一下在过去一小时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就必须进行简化,否则你将再现六十分钟的所有细节。如果我要求你实现某个目标,你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行动会有所成果。这是基本智慧,也是约翰·M.凯恩斯(John M. Keynes)那句经常被人引述的名言:“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观念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因此,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与实践相关,而是什么理论与之相关,以及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们不可避免会运用的理论的来源和局限。

---

\* 美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阿曼苏丹(the Sultan of Oman)国际关系教授。曾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副国务卿帮办。

\*\* 本文得到作者授权在本刊发表。原文参见 Joseph S. Nye, J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48-660.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 383.

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可进行普遍化的关于因果关系的命题,而这些命题在范围、简约性(parsimony)、解释性、规范性、处方性推论(prescriptive implications)方面差别很大。有些理论关注国际系统,有些注重国家,有些则关注个人层面。有些理论关注实质,有些则关注过程。有些理论非常抽象和普遍化,有些则充满中层解释(mid-level explanations),也有些在应用范围上非常狭窄。正因为简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选择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可以舍弃之时,偏见也在所难免。因此意识到这些习惯性偏见是非常重要的。

如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30年前所指出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严重的美国倾向。“唯一例外的是‘英国学派’,其立足于研究国际体系这一概念,涉及政治哲学、历史、规范性问题,并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格劳秀斯派自由主义的要素。除此之外,这一学科仍然深受美式科学主义的影响。例如,排名前十的顶尖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中,9家出版于美国;最近一项对全世界1084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发现,在25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来自美国东海岸学术机构的男性学者占了绝大多数,远远高于其在所有国际关系学者中的比例。

看到这些数字,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美国政策制定者会欢迎和理论家的互动,然而事实很少如此。正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注意到的,每当提及理论,政策制定者的眼神就笃定变得黯淡无光。保罗·尼采(Paul Nitze),一位相对学术型的决策者,曾经观察道:“自二战以来,美国人在‘政治学’名目下写作和教授的内容,与经历及常识往往相悖,其作为现实政策运作的指导,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也只具有有限的价值。”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二者之间的鸿沟往往更大。不少观察家已经注意到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增大。约瑟夫·列普格特(Joseph Lepgold)和米罗斯拉夫·宁契克(Miroslav Nincic)认为:“近年来,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专业性鸿沟大大加深。许多学

---

Alexander L.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2005, p. 26; Joseph Lepgold, “Policy Relevance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Joseph Lepgold and Miroslav Nincic, eds., *Being Usefu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363.

Stanley Hoffmann, *Chaos and Violence: What Globalization, Failed States, and Terrorism Mean for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 4.

Susan Peterson, Michael J. Tiemey, and Daniel Maliniak, “Inside The Ivory Tower,” *Foreign Policy*, No 151, 2005, p. 62; Ole Wøe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687-727.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Paul H. Nitze, *Tension between Opposites: Reflections o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 1993, p. 3.

者不再尝试走出象牙塔,官员们也越来越乐于忽视他们。”或者如布鲁斯·詹特森(Bruce Jentleson)所说:“问题不仅仅是理论和政策间存在鸿沟,而是这一犹如断层般的鸿沟近年来在日益加大。”

美国历来就存在政治任命的传统,这更适应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提出的所谓政府和学界之间的“出仕入学”循环(“in and out” circulation)。这一现象美国远比在欧洲、日本或其他有悠久文官传统的地区更为显著。尽管“英国学派”有着某些政策实用性,但在英国的传统之中,学术理论却远不如美国那样能直接影响到政府政策。美国在过去曾有许多重要的学者,如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都得以进入政府外交决策高层,但这一路径则显现出“单行道”的趋势。为数不多的一流学者得以登堂入室进入政府,而其中重返学界继续钻研学术理论的则更是寥寥无几。《外交政策》所列出的25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只有四位曾位列决策高层职务,两位在美国政府,两位在联合国。理论或许对实践来说不可避免,但大多数决策者——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却都倾向于避免与学术理论发生直接关系。

## 一、理论与政策间的鸿沟是一个问题吗?

一些学者乐于见到学界与政界之间存在着某种适度的鸿沟。毕竟学术理论家和政府决策者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英国学者克里斯多弗·希尔曾质疑道:如果学者寻求“政策相关性,哪怕只是用来向社会大众证明我们学者存在的价值,也会使我们的学术独立性变得更难维持”。正如马基雅弗利在四个世纪之前发现的那样,人在追逐权力的仕途中时,对当权者说出真相的风险就格外地高。不仅存在学者根据占据主导的政治风向调整其政治立场的危险(所谓政策相关性和学术堕落之间的权衡),还有更加微妙的风险,即理论家出于短期的政策相关性而放弃对有时对学术进步来说十分重要的抽象层次和优雅(所谓精确性和政策相关

---

Joseph Lepgold and Miroslav Nincic, eds., *Beyond the Ivory T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ssue of Policy Relev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Bruce Jentleso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2002, p. 169. See also, Joseph Kruzel, “More a Chasm Than a Gap, But Do Scholars Want to Bridge It?,”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8, 1999, pp. 179-181; David Newson, “Foreign Policy and Academia,” No. 101,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5-6, pp. 60-74.

Derek Bok, “Government Personne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John D. Donahu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For the People: Can We Fix Public Servi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55-272.

Christopher Hil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iren Song of Policy Relevance,” in Christopher Hill and Pamela Besho?, eds.,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6.

性之间的权衡) (我感谢史蒂芬·沃尔特对这一区分的帮助)。由此看来,象牙塔的隔绝有助于抵御以上诱惑,并且鼓励形成学界和政策的有益分工。

将大学视作独特的机构看似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所设想的政治相关性和学术堕落之间的权衡却不一定非要如此尖锐不可。在适当的议题上不妨采取中间立场,这就是我所说的“平衡投资组合”取向(the “balanced portfolio” approach)。但是这一比喻最贴切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能够在不同时刻分别居于“学术—政策”分工中的不同位置,并且有能力充当两者之间的桥梁。不过,正如上文所引的例子所表明的,能够同时在政策和理论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出仕入学者”已经日益少见。

过去,学界曾直接或间接地对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几十年前的学者,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卡尔·弗雷德里希(Carl Friedrich)、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都认为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是合适的。正如伦道夫·西弗森(Randolph Siverson)所说的那样,一些学术观点曾经对于政策设计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将著述和顾问工作相结合,谢林、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等人发展并且提炼出一套核战略和军控理论,二者皆在冷战中被政治家们广泛应用。而在最近,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鲁道夫·拉梅尔(Rudolph Rummel)、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人发展了康德的民主和平理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倾向于互不打仗),并且这一理论已经进入流行的政治话语和政策之中。

除了这些大理论,学界还发展出许多中等层次的理论,以及基于特定功能领域和地区研究的学说,这些都证明对政策制定者大有裨益。遏制理论、核恐怖平衡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及两极理论曾有助于塑造决策者所倚赖的政策词汇。对历史案例的类比曾经是决策者们所惯用的思考形式,尽管经常是以十分粗糙和具有误导性的方式进行。学者则可以帮助规范对历史类比的使用,避免误用。正如欧内斯特·威尔逊三世(Ernest Wilson III)所认为的那样,即便学者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也可以通过设计、描绘并且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公众和决策者。

从规范性的视角来看,这些记录能够用来支持以下观点,即学者们作为公民的一员,应当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到帮助改善政策思想的义务。并且,参与到政

---

Randolph M. Siverson, “A Glass Half-Full? No, But Perhaps a Glass Fill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search to Policy,”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No. 33, 2000, pp. 59-64.

对于地区研究的案例,请参见 Kenneth Lieberthal, “Initiatives to Bridge the Gap,” *Asia Policy*, Vol. 1, No. 1, 2006, pp. 7-15.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R.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Ernest J. Wilson, III, “How Social Science Can Help Policymaker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in Lepgold and Nincic, eds., *Being Usefu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122.

策讨论之中同样有助于学者们提高、丰富自身的学术工作,以及教育下一代的能力。正如戴维·纽瑟姆所说的,如果不是危及了下一代学术人才的教育,削弱了学术界对公众和政府官员认知国际问题和事件的未来影响力,那么日渐增长的学院派学者退回到理论和模型的幕布后面的趋势并没有多少重要性。教师们播下塑造每个新生代思想观念的种子,这或许就是学术界最持久的贡献。

此外,人们也许会争辩说,虽然学术和政策之间的鸿沟在最近数十年中不断加大使得政策制定付出代价,但是这一鸿沟同样催生出了更好的政治理论,而这比理论是否具有相关性更加重要。

## 二、现实世界对学术理论的影响

不论人们有关学术与政策之间正确关系的规范性观点如何,并不像一些学者所希望见到的那样,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学界远离决策圈。借用凯恩斯的那句话: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理论家们,往往是他们所看不到的更大的世界事件的奴隶。事实上,学术界的趋势和风尚都不时经历“窗外事”的过度影响。

学术界的理论趋势总是受到外部世界的极大影响。根据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和约翰·贝利斯(John Baylis)的研究:一位威尔士实业家为了避免欧洲所刚刚遭受的那种战争再次发生,1919年在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这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正式建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术作品也大都受伍德罗·威尔逊和维护国联努力的影响,表现为自由法条主义(liberal legalistic)和理想主义的模式。蒙二战和冷战所赐,以爱德华·卡尔(E. H. Carr)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独占鳌头。许多最具影响的美国理论家都具有欧洲背景,并且其学术思想反映欧洲的观点。的确,在将“国家行为是基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上升为几乎是一种客观法则之后,摩根索也不得不责备美国人没能按照他的理论假设行事。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一系列事件暂时颠覆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欧洲共同市场的进程使得诸如厄恩斯特·哈斯,卡尔·多伊奇等学者发展出了着眼于功能主义和信息交流的一体化理论。与此同时,跨国关系猛增。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复苏对美元带来的压力,使得美国无力再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越南战争越来越不受欢迎,并且招致全美甚至全球范围的抗议。最引人瞩目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石油禁运,导致能源领域剧烈的权力格局重组和发达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滞胀”)。不发达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摩根索将

---

David Newson, "Foreign Policy and Academia," pp. 64-65.

这一变革称为“政治、军事、经济权力之间功能性关系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分割”。这些背景环境催生出了有关政治经济关系的新一波理论,以及更加一般的有关权力和相互依赖的理论。举例来说,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及以《国际组织》命名的那本期刊)减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角色的关注,而是更多关注跨国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这些新的分支领域。

美苏缓和的终结、苏联入侵阿富汗、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小冷战”时期又充斥着对安全议程的关注。对核战争恐惧剧增,世界范围大规模示威要求“冻结核武器”。各大基金会加大了对安全研究及和平研究项目的资助,学术期刊也寻求有关安全而非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文章。理论家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安全研究占据主导。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剥离了大量经典现实主义的内容,提供了一套精练的结构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者如罗伯特·基欧汉则以一套仅包含少量变量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回应。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摒弃了大量经典自由主义内容,以便能够在其自身的理性主义根基之上回应新现实主义。正如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所写道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新”论战(“neo-neo” debates),使得原来有可能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论变成了有关国际关系的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理性模型之内的相对狭义的争议。

在冷战结束之际,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因为其静态性和未能预测和解释近代史上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变化而备受批评。一些观察者开始怀疑,是否国际事件已经证明国际关系理论是无关紧要的。一群被松散地称为建构主义的、具有多样性的理论家,开始着眼于研究“观念”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话语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拒绝将现存的偏好视作理所当然。相反地,他们提出了有关认同、规范、文化、国家利益及治理是如何被塑造和改变的重要问题。虽然建构主义有时被视作一种研究取向而非有关因果的理论,但它已成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主流理论的重要补充。

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国际关系不是一门实验室科学,历史可以说是国际关系最接近实验室科学的表现,当然我们对历史无法像实验室

---

Has J. Morgenthau, "The New Diplomacy of Movement," *Encounter*, Vol 43, No 2, 1974, p. 56

参见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 A.: Addison-Wesley, 1979.

参见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seph S.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1988, pp. 235-251.

Miles Kahler,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1945,"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 38.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391-416.

那样进行控制。因此即便在日常政治中没有表现出何种趋势,在基金会资助项目中没有体现出任何趋势,在期刊编辑的偏好中没有反映出改变传统的智慧,理论也一定会改变并不断演进。因此,华尔兹著作的标题——“国际政治理论”——在今天看来是不免有些傲慢的宣称,因为他的著作事实上是对已经逝去的两极时代的一种简约的结构分析。今天,用结构性的极的概念分析后冷战时代的尝试必须考虑到军事领域的单极,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多极,以及跨国层面混乱的权力分配。结构现实主义者曾经将跨国关系视作大国世界的附属,但今天他们却要面对这样一个世界,2001年的一次由一个非国家网络组织的突然袭击造成了比1941年由日本政府所策划的珍珠港偷袭还重大的伤亡。正如历史学家所熟知的那样,历史在每个时代都将重写,因为每个时代的世界看起来都不一样,而每一代人也都会提出新的问题。就国际关系理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情况大致相同。改变一下本文的起始句的表述——对理论来说,现实是无可逃避的。

### 三、对鸿沟之所以日益扩大的解释

存在这样一种介于学术界和政策圈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是既正常又有益的——不过其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假定人们会采取一定努力来跨越这一鸿沟。但最近一些年来,二者间的鸿沟在日益扩大,跨越鸿沟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渐增长的知识专业化,日益科学化的方法论倾向,以及新的制度性传送带(Institutional transmission belt)的发展都有助于解释这一变化。

但是这一鸿沟的某些方面却并不新鲜。学术界理论家的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世界总是涉及截然不同的文化。30年前,我曾以学者身份涉足国务院的政策岗位,当时我就被深深震撼了——官僚机构可称得上是一部巨大的造纸机器,每天生产出大量的文件,但是其顶端决策层却完全属于一种口头文化。我曾经如此描述那段经历:“政策圈的紧张步调并不允许广泛的阅读和细致的深思熟虑。大学的同事们常常送来三四十页纸的文章,认为可能对我有帮助,但这只能让我感到困惑和无奈。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快速浏览一下情报简报和政府文件而已——这些都是我的各位特别助手标注出来的,以备我每天可能有的一到两个小时的阅读所需。因此,有效的政策备忘录通常只有一到两页纸,而且简要的口头简报经常比备忘录更有影响。傅高义曾对其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中的经历有如下记述:“一般来说……学术书籍和文章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毫无用处。即便其中并非充斥着的只写

---

Joseph S. Nye, Jr., "Studying World Politics," in Joseph Kruzel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Thirty-Four Academic Traveler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9, pp. 199-212.

给其他学者看的神秘理论和深奥详述,这些出版物对决策者来说还是太冗长了,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在里边大海捞针般寻找对他们可能有用的东西。”

是否重视时效是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对学者来说,时间是次要因素,而逻辑的准确和理论的优美则是主要的。而对于政策实践者,时间就是全部。为总统下午三点会见外国政要的会议所准备的备忘录,如果能按时完成,即使质量只是“良”,也称得上是成功的;如果在四点才完成,那么哪怕是“优等”的备忘录,也是彻底的失败。但在大学里,优先次序则是(恰当的)相反的。另一大区别则是与个人创造性相对的团队作业。在大学里,剽窃是最严重的犯罪;但在政府决策工作中,观点是公共品,而且出于效率的考虑,一般最好不要将之归功于某位个人。最后,学术界中最高价值就是无视政治,对当权者讲真话;但在决策圈,某些政治性修饰和对“实用真理”(applied truth)的了解也许对于提高效率是重要的。在两种文化之间“骑墙”并不容易。我在《华盛顿的权力博弈》一书中,曾以小说形式戏剧化地呈现这种道德两难。

但是学术界和决策圈内任的文化鸿沟近年来日益增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领域和外交政策制度的发展趋势所致。史蒂芬·沃尔特解释道,学术界的激励结构和专业风气发生了嬗变,而且作为联系学术和政策的传送带的“渗漏”模式(trickle-down model)被削弱了。在他看来,“学术界盛行的规范,越来越来越不鼓励学者们从事与决策直接相关的研究。”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这类普遍性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而能使理论家们兴奋不已的理性选择模型,则经常反映出霍夫曼所说的“对经济学的艳羡”(“economics envy”)。中等层次的概括理论、历史案例研究、地区研究等决策者最易接受并且对外交实践最有用的理论,在目前的学科等级秩序下其名声远逊于抽象的普遍性理论。学术界的方法论加强了这一趋势。正如詹特森所质疑的:“主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漠视政策研究,轻视应对战略问题和评估政策选项的分析性技能。以学术生涯为主要目标来培养博士是一回事,而以之作为大多数主要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博士项目的几乎唯一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新毕业博士就业市场的压力使得这一激励结构得以实现操作化。”教授们将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复制下一代的教授之中。

这一问题由于大量学术专业术语的使用,以及学者们对使用平实语言与政策圈沟通不感兴趣而变得更加复杂。如乔治所说:“许多经常接触学术文献的政策

---

Ezra Vogel,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cy and Academics," *Asia Policy*, Vol 1, No 1, 2006, p. 33.

Joseph S. Nye, Jr., *The Power Game: A Washington Nove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Wal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6, 38.

Hoffmann, *Chaos and Violence: What Globalization, Failed States, and Terrorism Mean for US Foreign Policy*, p. 4.

Jentleso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p. 178; Philip Zelikow, "Foreign Policy Engineer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Back Ag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1994, pp. 143-171.



专家都曾表示,大学教授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彼此交流而著述,而且他们并不倾向,也没有能力将他们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年轻的学者们因为登上同行评议的专业学术期刊或者被其他学者在这些相同的期刊引用而获得好评或者得到晋升,但这其中是否使用清晰易懂的英语却丝毫不打紧。那些在以更广泛的读者为对象的政策期刊上刊登文章的学者,几乎得不到任何肯定。

在制度层面上,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传送带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大学不再是政策观点的主要来源。在传统模式下,教授们通过他们撰写的文章或者教授的学生将自己创造的理论通过向下或者向外“渗漏”传递给决策圈。正如沃尔特所描绘的那样,“渗漏模式假定新的观点萌生于学术‘象牙塔’之中(比如那些抽象的理论),逐渐向下渗透进入实用分析家(特别是那服务于些公共政策‘智库’的人)的研究之中,并最终得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知觉和行为……但是在实践中,观点影响、塑造政策的过程要远比渗漏模式所设想的更具特殊和偶然性。”或者,像詹特森写道的:“三四十年以前,学者们是政府和国际机构之外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国际事务专家,但是今天各种观点和专门知识则处于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之中。”

即便学者们通过给政策期刊撰写文章,给报纸写评论,写博客,或者给候选人或政府官员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来弥补“渗漏”模式的不足,他们依然会发现太多竞争者在同自己争夺决策者的眼球。一部分这类传输机制是作为学术观点的传送器或者额外的传播渠道出现的,但更多的则加上了智库创立者或者资助人的偏见。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200家智库,并且它们在视角、资金来源、意识形态和定位上都大相径庭,但是总的来说,大学提供的还是一种更为中立的观点。智库不仅提供观点,而且储备着能够及时提供评论和咨询的专家。除此之外,记者、公共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贸易团体、承接研究项目的个人等等,都不同程度参与到提供政策观点的过程之中。正如威尔逊三世指出的,虽然制度路径的多元化也许有利于民主,但是许多非大学机构不仅具有相对狭隘的利益,并且裁剪政策建议以适应特定的议程需要。由于具有议程更为广泛、知识规范更加严格的学术共同体的退出,民主制度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因而受到损害。

一种最有效的从学术到政策的传输机制之一,或许可被称为“出仕入学”者脑中的“嵌入式资本”(一个被沃尔特基本忽视的机制)。正如基辛格所说,决策者面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p. 7.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0.

Jentlese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p. 181.

Richard N. Haass,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Vol 7, 2002, pp. 5-8.

Wilson, "How Social Science Can Help Policymaker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p. 122.

临的时间压力意味着他们必须依赖那些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储备好的思想和知识资本。我自身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20世纪70年代我在卡特政府负责制定核不扩散政策。我们所施行的劝阻建设增殖反应堆和商业利用钷能源的政策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均受到谴责,例如,1977年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召开的那次会议。由于我所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我认为这不是一次代议性会议,而是一次可能会强化特定传统主张“拥核观点的跨国联盟。在我看来,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包含更多外交和防务官员话语的焦点应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也许会被理解为实践中的建构主义,即使此时学者尚未发明这一概念)。通过创设了一个“多年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估机制”,美国得以建立一个替代性的论坛以实现信息共享,以及一个防务官员的政府间网络来协助前者运行。

第二个案例来自我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时的经历,当时我负责制定新的东亚安全战略。许多人关注中国的崛起,有人鼓吹在中国变强大之前实施遏制政策。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方法必将招致中国的敌意,且将不必要地降低未来双边实现良性关系的可能。但是,将中国视为朋友并不一定能保证中美友好。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兼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战略,通过重建与日本的安全关系,我们得以确保中国无法对我们打“日本牌”。这一战略的第二部分则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假设之上。我们避免使用遏制的话语,向中国开放市场,并且支持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称这一战略为“融合,但同时对冲”(integrate, but hedge)。如果中国实力增长之后开始变得富于侵略性,那么日本可以作为实施遏制中国政策的关键伙伴;但是,如果中国随着自身繁荣和相互依存纽带的深化而变得温和,那么世界将会见到一个更为良性的结果。虽然对于未来仍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一政策非常稳健,能够预防失败,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

这两个例子能够说明,在大学背景下产生和储备的知识资本和理论思想是如何有助于华盛顿的政策变化。政治学理论对于我推敲和构筑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方式至关重要。当然,这更多地来自嵌入式资本而非外界的文章或咨询(尽管它们起到了一些作用)。一些人也许会质疑这种机制成本太高,我毋宁待在大学里潜心钻研出更多的学术思想,也许我也会这样做。选择必然会有得有失,而且无论什么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庆幸我付出了这些机会成本。不

---

Joseph S. Nye, Jr., "Maintaining a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5, No 1, Winter 1981, pp. 15-38

更详细的阐述,参见: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1995, pp. 90-102;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有关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学术理论的反方意见,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仅因为我能够对我所关心的重要议题的政策制定做出贡献,而且因为我相信当我重返大学之后,我的著述和教学都将得到进一步丰富而不是削弱。

政府决策工作是一次有深度但是略显狭隘的经历。那里不允许,也没有时间像在大学里一样随心所欲地探索新知。比如,我在处理核不扩散问题时,面临的是外国官员们“为什么美国可以发展核武器但却试图阻止他们获取核弹”的责难,此时,我根本没有时间探讨更广泛的伦理问题。但当我重返大学之后,由于不再有时间和政治的压力,我因而能开设一门课程并随后出版了《核伦理》一书。当我从五角大楼和那里的东亚问题中抽身之后,我就能集中精力研究未来权力分布的问题并且发表新书《美国霸权的矛盾》。无论结果好坏,这两本书都深受我在政府工作经历的影响。

我这些学术和政策之间的互动经历也许是主观的,但却并非绝无仅有。无独有偶,傅高义也曾如此写道,“当我步入华盛顿而且第一次被迫撰写一页纸的简报时,我因为要用原声摘要替代我的真实思考而大为沮丧。但是继而我开始欣赏一页纸简报规范思维纪律的作用。这样的空间限制,强迫我们去思考什么是绝对重要的,是我们最想表达的,而且要思考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结果,当我回到大学之后,我开始鼓励我的学生们提炼他们的思考,而且努力将其用一种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出来”。威尔逊三世、詹特森等人也有相似经历。

#### 四、结论:我们该做些什么?

如果上述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存在性定理(existence theorem),即学术界和决策圈可以有卓有成效的双向互动,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加强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并且弥补不断扩大的鸿沟呢?在政府方面,前大使戴维·纽瑟姆曾建议他的同僚们增加国务院的研究经费,扩大学者——外交官项目,并鼓励资深官员参加学术研讨会。情报团体,更具体一点说,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应与学者一道定期举办公开的学术研讨会。实习和交换项目,例如由美国外交学会设立的外交事务奖学金同样有助于将年轻学者引入政策环境,尽管在每年颁发的十几个奖学金中,来自大学的比例正在日渐缩减。学者平行调动到中

Joseph Nye, Jr., *Nuclear Eth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Vogel,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cy and Academics," p. 34.

参见 Wilson III, "How Social Science Can Help Policymaker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Jentleso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纽森 20 世纪 70 年代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助卿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译者注  
Newsom, "Foreign Policy and Academia"

层决策层的数量逐渐增加,这对政府和学术界来说都是好事,虽然对具有很强文官传统的国家来说这还是比较困难的。网络和博客的出现同样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可以在全球层面参与政策争论。在学界方面,沃尔特赞成“有意识地改变学科的主流规范”。各系所在招聘和提升职称的决定中应更多考虑学者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力,学术期刊在评审稿件时也应更加重视政策相关性。大学也应当激励年轻教员参与政策而促进学术界对于现实事务的兴趣。既然许多年轻学者都是风险规避型的(这一点可以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对不受欢迎的政策立场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人们也许会上述建设性意见加到一起,但是青年学者们不应该守株待兔似地期待着上述建议逐一成真。如果有什么趋势的话,学术界的趋势看起来似乎与上述预想背道而驰。当青年学者们问我该如何结合对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兴趣时,我会给予他们以下建议:

1. 首先巩固你的学术地位。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小心行事,不要冒险。学术界和决策圈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单行道。打好你的学术资历基础,因为从学术界入决策圈易,但从政策圈返回学术界难。

2. 学会用清晰的语言表述而尽量不要使用专业术语。这会使你的思想容易为决策者所理解,使你的学术著作吸引更多广泛读者的关注,同时也能使你的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

3. 选择那些不仅在方法上,更是在实质内容上让你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注意不要选择那些过于容易驾驭的问题,以至于结果你用长篇大论来论证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是学术界目前的通病)。“对重要问题的差强人意的解释,胜于对细枝末节的精确的回答。”

4. 加入公共决策争论。在不影响学术研究的情况下,不时写一些专栏评论、博客及政策文章。

5. 在加入专业政治学协会的同时,也参加到政策网络之中。这些联系都是有用的,而且你能学到可以提高你的学术研究的東西。

6. 理解学术和政策之间的传送带,并且明白二者涉及的时间和声誉成本。

7. 确定什么能赋予你的人生以意义。

8. 现在就做。

(王 栋 姜 鑫 译)

---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1.

Ibid

Robert D. Putnam, "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Public Role of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No 1/2, June 2003, p. 251.

Theorie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ong Wei* (80)

Presently in the academia, there is a divis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is: theory is generally not applicable to actual policy;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misunderstand the theories; theorists do not participate in policy analysi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take ar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ed to be directly implemented in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Moreover, inference of theory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oreign policy theory both realiz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use of theory in policy analysis. Also,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oretical thought is crucial to policymakers.

“Recovering Diplomacy”: Theory, Systems, and Practice..... *Xiong Wei* (93)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plomacy is not emphasized.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First,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tudies of diplomacy has diminished. Second, government-led diplomacy is declining. Institutionalism can contribute to agenda sett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diplomacy. Research on specific topics, strategies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s, the impact of the diplomatic system on China's diploma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great power prestige and its diplomatic measur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s diplomatic decisions can a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for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 *Joseph S. Nye, Jr* (10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nc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U. S. foreign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practice of foreign policy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cademia and policymaking circles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is growing wider. Academia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o promot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cholars should also increase pragmatic an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to Bridge the Gap ..... *Kenneth Lieberthal* (117)

Broadly,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fa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textual issues—how a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 works, the detailed history of key issues, and so forth—than high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typically have. But scholars rarely understand the reality that policymaking entails enormous attention to specific operational steps and internal consensus build-